

# 试论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

杨式挺

## 一、南海“丝绸之路”研究简况

要研究南海“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作“丝路”),必须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概况有所了解。笔者因20世纪90年代策划广东省博物馆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陈列和参与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与香港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南海交通贸易二千年》展览暨学术研讨会,以及1993年8月至9月间赴日本广岛参加举办《南海海域沉船文物展览》,因而对南海丝路的研究近况有所了解。

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可谓是个老课题,但也是个新课题。说它是老课题,因在我国长达两千年的浩如烟海的“廿五史”及“出访记”等著述中,已有关于“四裔”和外国列传的记载,近百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关于中西交通史、中国南洋交通史的专著。<sup>[1]</sup>说它是个新课题,是指在新的世纪,如何以新视角、新目标、新方法进行新研究,这可以说还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事。

改革开放,中国要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世界也要求了解中国,研究“丝绸之路”,重温那和平友好的互通有无的交通贸易史、文明交流史,对于今天和明天,能够起到继往开来、兴国兴邦的积极作用。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省和有关市、县,也为此开展了多项考察活动,召开多次学术会议,举办多个专题展览,出版了多种著述和图集,以期让这条“千年通有无,万里扬中华”的“中国昔日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焕发青春,重放异彩。

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广东省博物馆年轻的文博研究者李克勤同志在一篇有分量的遗作《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世界之路》中深刻地指出:“丝绸之路向各个方向的不断拓展,给以中原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以至深至巨的深刻影响。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所代表的北方游牧文明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海洋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不断碰撞,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一串串光彩夺目的耀眼火花。”

“丝绸之路向各个方向的不断拓展,也给沿途各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之间开展物资、知识、思想和价值交流的重要桥梁。这些交流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沟通和发展了东西方文化,形成一幅绚丽多彩的丝路文化长卷,也使丝绸之路的历史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珍贵遗产。”

李克勤接着指出:“还是为了这条丝绸古道,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最初几年中,4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国际远征队’在这条人类最古老、最漫长的国际商路上穿沙漠,跨戈壁,翻雪山,过草地,涉重洋,追寻着人类古文明以及张骞、甘英、亚历山大、法显、玄奘、马可·波罗和郑和等(笔者按:还有班超、康泰、朱应、义净、鉴真、

周达观、汪大渊、王大海、谢清高、慧超、圆仁、苏莱曼、伊本·巴图塔、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等）这些为东西方交流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先人们的足迹：1990年中国西北沙漠丝绸之路路线考察；1990年秋至1991年春意意大利威尼斯至日本大阪的海上路线考察；1991年夏中亚6国的草原路线和1992年夏蒙古阿尔泰山游牧路线考察”。<sup>[2]</sup>

广东省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和研究，得到了世界有关友好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如《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序言中写道：“为了对‘丝绸之路’进行跨洲、跨国、跨地区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关于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8）活动议案，活动内容包括‘丝绸之路’综合研究。”<sup>[3]</sup>为了配合和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1991年春对广州—泉州的考察，广东省文化厅组织有关单位编制了《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sup>[4]</sup>

与此同时和稍后，广东省社科院、广州市社科院、市名城办和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单位，分别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sup>[5]</sup>1992年广东省、广州市博物馆分别举办了《南海丝绸之路》陈列；1996年，广东省、广州市博物馆与香港历史博物馆在九龙联合举办了大型的《南海交通贸易二千年》展览并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图集；<sup>[6]</sup>1994年8月间，在汕头大学和南澳县（岛），举行了“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美国、法国、香港及内陆各省市专家学者八十多名，提交论文六十多篇。那次会议似是20世纪在广东境内召开的首次海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sup>[7]</sup>此外，湛江、徐闻、海康（雷州）、遂溪等市县也开展过研究活动，出版过有关著述。<sup>[8]</sup>

上述活动和研究表明，若从跨洲、跨国、跨地区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视角、新目标来看，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还是一个意义深远方兴未艾的事业；广东—岭南具有研究这一课题的深厚基础和有利条件。

## 二、与南海“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发现

首先，应当对“丝绸之路”的含义有个基本的了解。“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一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在华作长期考察之后，于1877-1912年陆续出版三卷集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书中率先提出 die Seidenstraße（丝路），它指的是自我国中原地区（如汉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通过西域（主要是新疆）到达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陆路，是为古代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和文明交流的大通道。<sup>[9]</sup>它是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至元朔三年（前126）由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首先开辟。“它对于打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闭塞，促进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通都起了重大的突破作用”<sup>[10]</sup>。因为自汉代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年间，我国出口的物品以丝绸最具特色也最为驰名，故称之为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mann）于1910年出版《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

路》一书也使用了丝路一名。唐宋以来，我国出口的以著名的深受外国人喜爱的陶瓷为大宗，进口的以香料为主，故有人提出应名为香瓷之路。由此可见，丝绸之路只是一个代称、美称，其历史内涵和意义远不止限于通商贸易。后来，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从陆路输出也有经由海路的。如法国汉学家沙毗(1865-1918)在其《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了“丝绸有海陆两道”的重要观点。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知名汉学家饶宗颐教授和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先后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sup>[11]</sup>从此，“丝绸之路”(丝路)，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一名便广为学术界所认同和使用。笔者以为，陆路与海路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如汉唐宋元等王朝都建都在中原地区，海上丝路要先走陆路，再走水路。又如东晋法显和尚所著《佛国记》，记录他沿陆路丝路到印度取经，后取海上丝路回国。海路还可分为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表明，西南“丝绸之路”的历史可能要比张骞通西域的年代早。<sup>[12]</sup>西南“丝绸之路”也可能与南海“丝绸之路”有关。

其次，笔者以为，只有对“丝绸之路”的具体历史有所研究，考古学才能有的放矢地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因为“丝绸之路”属于历史科学的一门特殊的分支。研究它首先要依靠历史文献包括中外历史文献。下面举两个问题说明。

一个是年代和分期问题。香港学者陈佳荣在他的《中外交通史》一书中，把中国古代对外交通史分成八个时期。其发展趋势大致如下：

(1)先秦至秦代：中外交通之传疑、萌芽时期；(2)两汉时期：中外交通开拓时期，陆路居于主位；(3)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外交通持续发展，陆路仍居主位；(4)隋唐五代：中外交通之勃兴时期，海路日趋重要；(5)两宋时期：中外交通持续发展，海路居于主位；(6)元代：中外交通之鼎盛时期，陆路臻于顶峰；(7)明代：中外交通继续兴盛，海路达到极点；(8)清代前期：中外交通之新旧交替时期。<sup>[13]</sup>

这种分期是“根据中国历史之发展和各个时代之不同情况”。该书主要根据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

又如：《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图录一书，则把南海丝绸之路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

(1)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海上交通贸易的兴起(前770—前111)；(2)西汉中期至南朝——海上交通日益频繁(前111—589)；(3)隋至元代——海上贸易空前繁荣(589—1368)；(4)明至清代——全球经济海上循环(1367—1911)，明清海上贸易——广州、香港、澳门。<sup>[14]</sup>

本图集的分期是以粤港澳考古发现，结合南海“丝绸之路”的历史文献和具体发展而提出的。

再一问题是关于西汉政府开辟南海丝路的历史的问题，最早最明确的记载，还应是《汉书·地理志》那段千古不衰的名言。近百年来有多少中外学者为之历险考察艰辛考证，迄今尚无一致意见。这里引用几说，以窥一斑。



一是据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一书第一章指出，此文虽简，要可考见汉代与南洋交通之梗概。（一）是可知发航地在今之雷州半岛，所乘者是中国船舶，在远海中则由蛮夷贾船转送。（二）是可知入海者是属黄门之译长，带黄金之类而往，沿途交换明珠、璧流离（玻璃珠饰）、奇石异物而还。所难知者是汉朝译使所经历的地方和国家应是今日何处何国，迄今尚有分歧。如黄支当《大唐西域记》卷十之达罗毗荼都城建志补罗，夫甘都卢国当今缅甸之蒲甘城，等等。这也是许多中外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

二是见陈佳荣《中外交通史》一书的考证意见，抄录于下：汉朝乘中国船只离开日南（郡名，治今越南广治）或徐闻、合浦（均在今雷州半岛）后，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来到湄公河三角洲，泊于即今部的迪石一带。复沿中南半岛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抵大秦的湄南河河口，停靠在邑卢没即今佛统（为古之贸易港）一带。由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谿离。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到达夫甘都卢，即今缅甸之丹那沙林。从夫甘都卢再度登船，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终于抵黄支国即今印度东南岸之康契普腊姆。回国时，由黄支南下于已程不国即今之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即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来月，由皮宗驶还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今越南维川县茶养）。

三是对书中一些地名的考证，与李金明等著《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一书的考证有所不同。<sup>[15]</sup>

四是已故邓端本研究员认为：据史书记载，在当时横越马来半岛的主要商路一共有四条：第一条路线由克拉克地峡东岸附近的巴蜀西行，陆程至雅令加，或雅令加西南的盘惠色部，然后改由陆运，顺流直下丹老；第二条路线是从东岸的万仓港乘船至山国河上游，再步行至大瓜巴河下游，然后重新坐船至大巴瓜港；第三条路线是从夜功河流域的逢迪（在今佛统附近），经三塔径抵达西岸的毛淡棉（在今缅甸境内）；第四条路线是从六坤至董里（即投拘利）。按《梁书·扶南国传》载，当时的克拉地峡是属顿逊国，顿逊是东西交通孔道，东南亚地区国际贸易中心，来这里贸易的日有万余人，珍货宝物，无所不有。该书说：“从交州往印度的客商都要在这里登陆，因涨海无涯岸，船舶未得径过也。”鼓商人多集中在此贸易交换。这里一带的确发掘出中国制造的铜镜，印度笈多王国的铜器，还有公元1、2世纪的罗马式灯盏。书中所记汉使归航时经过的皮宗，便是马来半岛的香蕉岛。三国时孙权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发达，顿逊是它的属国。在扶南国首都不远，有个呵克呵的国际贸易港（在越南迪石北部），在公元1至2世纪间已非常繁荣。考古学家曾在这个古港遗址发现出罗马念珠数千枚、镶有罗马王像的金薄片徽章两枚，中国制造的铜镜一枚和波斯制品玻璃质圆片等。<sup>[16]</sup>

再次，说一说关于南海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笔者曾想从辞典类书查一查什么是南海丝绸之路，有什么考古发现，结果是收效甚微。检索丁守和主编的《中华文化辞典》，查

到一条叫“中外关系方面的考古学研究”，该条目写道：“对同‘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发现，主要是波斯萨珊朝银币、金银器、织锦和东罗金币、玻璃器等文物，都曾作过详细的考察。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除在宁波、泉州两地发掘宋代沉船的海舶外，着重进行古外销瓷问题的专门研究。”在同书 244 页“航海技术”条目中这样写道：“中国濒临太平洋，有长达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有着辽阔的海疆。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与海洋打交道，有证据表明，中国的航海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五六千年以前。秦汉以后，中国的航海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到宋元时期已成为世界海上交通贸易大国，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更是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历史上，中国开辟有东北至日本、朝鲜，东南至东南亚诸国，西南至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各国以至东非的航线，甚至开辟有直接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航线，对世界的航海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长期的航海活动中，中国发明和掌握了一系列先进的航海技术，其中天文航海的过洋牵星术，地文航海的测深、测速技术，以及季风、指南针、航海图、针经的运用等，都在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曾经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指出：‘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明，随时可见。……中国的海上航队，在 1100 年-1450 年之间肯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胡菊人：《李约瑟与中国科学》第 122 页）。<sup>[17]</sup>

与南海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发现材料，事实上在本文的第一个问题中已经提到，特别是集中在《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和《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图录中。

这里，仅以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专题陈列为例。该陈列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发展线索，以馆藏的三百多件文物展品（含实物、复制品和照片）为材料，分四个专题，力图反映两千多年来南海丝绸之路的光辉历程。一、海上交通路线与交通工具船舶；二、中外货物和商品交流；三、中外货币；四、宗教文化科技交流。

以下只能列举一些较重要者。在海上交通工具的舟船方面，广东一岭南的考古发现可能居于全国之冠。如珠海高栏岛宝镜湾发现的春秋战国巨幅刻画中，有明确的海船图形和人物、动物纹样，是先秦越人敬海、祭海与舟船相依为命的生动写照。

到了秦汉时期，番禺（今广州）成为赵氏南越王国都城，并成为中外商贾云集、珠玑、犀、象、果布之凑集散地，成为西汉全国经济繁荣的都会之一。1983 年象岗山南越王墓的重大发现可以证明，早在西汉时期，古番禺已有西方罗马帝国和西亚，甚至更远地方的舶来品，是中西海上贸易的证物。南越王墓出土的 5 件原支的大象牙，可能来自非洲，广州西汉前期墓地出土多件陶象牙犀角，一件盖和身均饰突瓣纹的银盒，与伊朗古苏撒城（今舒什特尔）出土的银盒相似。一件罕见的四连体盖带镂孔的铜熏炉，是装香料熏香的，陶熏炉在广东汉墓普遍发现，而当时香料主要产于东南亚，也有产于红海的。南越王墓西耳室发现有大量丝绸织品，可惜均已腐朽，但还发现有两件铜印染工具，用于在丝织品上套印纹饰，其纹样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有相似的图案花纹，不过，目前尚无证据

证明南越国有丝绸出口。南越王墓还发现一件铜提箫，上刻绘有四艘海船纹样，上有戴羽冠、穿羽裙、手执短剑长叉斧钺的战士和被绑的战俘；船的前后有大海鱼、海龟、海鸟，表明他们是海上战船。而在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铜鼓和越南提箫上也有相似的船纹和羽人。广州横枝岗和游鱼岗等两汉墓中，出土有一件蓝色玻璃和一些蚀花珠串，不含铅钡成分而为钠钙玻璃系统的玻璃珠，应属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罗马中心或东南亚等地舶来品。徐闻县华丰村西、龙塘红坎村东和附城槟榔埗等处约80座汉墓也出土有玛瑙、琥珀、水晶、玻璃、檀香珠等308粒，相信也会有舶来品。

广州以及广东两汉墓出土的木船、陶船模型（明器）达15件，堪称中国之冠。<sup>[18]</sup>据分析，种类有彩绘楼船，客货两用船，内河货船和一般的木船和陶船。以1955年先烈路东汉墓的一件陶船最完整。但似未发现一件可出海航行者。1980年西江河畔的德庆县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陶船，其造型和特点可能适于沿岸海上航行，船艏、船尾上翘，船尾设有舵室并附船舵。不过，在此顺带一提，1974年以来，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的秦造船厂遗址，是一处十分重大的考古发现，被列为国保单位，载入各种著述。然而去年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上，受到了来自全国船舶史、古建筑、地理学、地方志和考古学界专家学者的质疑，以至否定是造船台。如果否定意见成立，它将对番禺是汉代的始发港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写到这里，自然联想到为什么《汉书·地理志》把我国西汉南海远航的始发点定为“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而未提及番禺（今广州）呢？而船行的地点顺序，为什么是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而不是徐闻，合浦，日南障塞呢？因为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玕、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再从上述广州的考古发现，从年代多早于徐闻、合浦、日南，从数量和“品位”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情况应与南越国国都和商贸都会地位是分不开的。但国都、商贸都会是否一定要与始发港存在必然联系呢？

不久之前，笔者为陈佳荣《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一文作责任编辑，该文刊发在《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号上，<sup>[19]</sup>文中提出了两点颇有启发性的见解，该文写道：在判定西汉南海对外远航始发点的问题时，除了史载、文物外，还必须考虑两个因素：（1）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属汉朝版图，而日南等郡对外交通，应较番禺郡频繁；（2）依当时航行水平，北部湾乃南海最佳对外航行区域。此外，该文还认为日南障即日南象林界、日南郡最南一县，徐闻（今雷州半岛南端）、合浦（今广西北海北面）和日南三地是并列的，三地均可发船。

再者《汉书·地理志》载，元封元年（前110）汉军由徐闻县南入海得大洲即今海南岛，于是设立了儋耳、珠崖两郡。如果当年汉军走的是秦军南下的主要路线即经黔桂、湘桂而达合浦、徐闻、海南岛的话，那就是说不是非经番禺不可。这又使笔者想起在郭沫若



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有这样的论述“从中国的交州合浦郡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乘船去缅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汉时就开辟。”“两汉时期……与南边诸国的船舶的出发站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sup>[20]</sup>这段话早已说得明白而又贴切。

三国以来，南海丝路出海航线明显东移，广州的地位明显增强，取代徐闻合浦港。据陈泽泓先生考证，孙权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是经过广州的。1974年至1975年开展的西沙考古，在北礁岛打捞出南朝六耳陶罐等文物，证明自三国以来，南海丝路是从广州到海南岛东面经西沙群岛出南海的。

自南朝尤其是唐宋以来，我国的出口货物，除丝绸外，陶瓷是一项主要的输出品。广东与外销有关的陶瓷窑址及产品，较重要的有梅县瑶上唐代水车窑，产品在泰国曼谷有发现，1977年在珠海伶仃岛附近海域打捞一批唐代陶瓷应是准备出海时沉没的。潮州唐代窑址，潮州笔架山北宋窑址，其产品在东南亚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巴勒斯坦有发现。广州西村北宋窑址其产品主要是为外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名窑及其产品如唐长沙窑，宋耀州窑、龙泉窑等产品也从广州或广东外销。其实，我国陶器传出海外可追溯得很早。印尼就出土有东汉龙柄陶甗。唐宋至明清我国伟大发明之陶瓷外销几乎遍及亚、非、欧美各地，而且大多数是从海路运出去的。<sup>[21]</sup>

南朝时期遂溪边湾发现的一批外国金银饰物以及遂溪、英德、曲江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383-484)银币（见图一），是当时国际流通的货币，遂溪发现的银币中，年代有早于波斯及滑国正式入贡南朝（建都今南京）的，年代有伊卜尔三世至卑路斯(383-484)的，表明应是从海路贸易流入的《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



图一 波斯银币

1984年遂溪县附城边湾村和一批金银器在窑藏出土。有二十多只。正面为国王像，背面为祭坛、祭司。属波斯萨珊王朝银币。铸造年代大约在沙卜尔三世至卑路斯之间。广东出土的波斯银币，其中钻有孔的，可能是流入当地后用作银饰品。

近十年来，湛江及徐闻、雷州、遂溪等亦有考古新发现及研究成果，对雷州半岛在南海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大有增色。以下只举三个例子。

其一，“臣固私印”铜印小考。据发掘简报和发掘者著文介绍，“臣固私印”（以下简称“固印”）1993年出土于五里乡二桥南湾村，为村民建新屋时所挖到。<sup>[22]</sup>“固印”长方体，印纽为一伏龟，印面有“田”字格刻阴文（白文）“臣固私印”四字，质地为青铜，表面呈铜绿色，但锈蚀并不严重。长2.5厘米，宽2厘米，通高1.3厘米。并说“固印”经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鉴定为“汉印”，做工较粗，可能是急就章。<sup>[23]</sup>此前，笔者已从《丝港风韵》（《徐闻文史》第13辑）一书上，读到邓开朝、吴凯《丝路探秘五十年》一文，谓1993年冬发掘二桥南湾汉代遗址时，发现了汉官“臣固私印”。“臣固私印”的发现和海南发现的“朱庐执刼”同日可比。可见作者一开始就将此枚“私印”视为“官”。

吴凯在《徐闻汉印的价值和品位》（或题为《粤海遗珠说汉印》）一文中写道：徐闻县的“历史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五里乡南湾村出土的‘臣固私印’和海安镇广安村出土的‘张己印’可见一斑”。<sup>[24]</sup>笔者未见到“张己印”实物，本文不论及。

文章说，徐闻汉印使用的是铜质，且鎏金（笔者按，“固印”原本是否鎏金？发掘简报无载，故本文依据简报）说明印主非同一般。如“臣固私印”，印主名固，对朝廷皇帝称臣必然是朝廷命官。……汉代丞相、三公、列侯、将军的印制，都是龟钮金印。

文章认为，印主应是《后汉书》“窦融列传十三”所记的窦固（字孟孙），少为“黄门侍郎”，中元元年（56）袭父封显亲侯……章和二年（88）卒，谥为文侯；他曾“与马援交结”，按他的职级可在“列侯”之位。

吴文引史树青先生认为“臣固私印”是一枚“急就章”，又引刘一闻《印章》谓：“印章是权力等级制度的象征”，“急就章”是为了军事需要而产生的。“可见这印在当时军事活动中有一定作用”。文章又谓：“由于印章的核心是‘示信’，那么它又与礼仪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在商业贸易、交游等社会活动中也不可或缺。窦固身为黄门侍郎，后又封为显亲侯，莫非他便是史书所载的黄门译使，左右侯官。这印肯定与交易有关。”云云。

文章最后还提到海安镇发现的“张己印”，指出“以管窥豹，徐闻汉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层面。美丽、繁荣的汉代徐闻港，徐闻城图景应在方寸之中”。

笔者读了以上两文，文中又提及徐闻汉印可与笔者作过考释的汉“朱庐执刼”银印同日可比。因此，笔者感到徐闻二桥、南湾发现的汉印十分重要，也感到有些疑难问题尚待进一步共同探讨。于是写信询问湛江市博物馆阮应祺馆长，他寄来照片和该印拓片。为了慎重起见，笔者又向叶其峰研究员及其专著《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一书（以下简称《鉴定》）求教。下面讨论几个问题并提出个人的初步看法，以供研究参考。

1. “臣固私印”的特征和年代推断。首先应当提到，“固印”现存湛江市博物馆。笔者借此次“南海丝绸之路”研讨会之机，得以三次参观该馆陈列的丰硕文物，其中一次是



11月24日晚上陪同故宫朱家潘老先生去的，并承馆长同意将“固印”提出观赏。笔者的第一个印象是此印是长方形印，与汉“通官印”方寸之制不合（汉制一寸合今2.35厘米）我国现存西汉包括新莽官印多在2.1-2.7厘米之间，而以2.3-2.4厘米为多见。此印印本较薄，龟钮也较低，所以通高才1.3厘米，不像东汉以后印体较高，龟首也较仰。此印制作不精，如边缘不甚规整，印面也不够平整，“私”字笔画略有缺损。是否即史树青先生所谓的“急就章”呢。印面现有“鎏金”（或说涂金）但有点新鲜感，是否原有鎏金尚待请行家鉴定。因为官印的鎏金，金质和铜质意义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其峰先生在给笔者复信中说，“臣固私印”印面有界格，从汉印发展规律考察，凡是有界格的印章均较早，绝大多数在西汉早期，极个别在西汉武帝时期。此印文字刻得很差，但其“印”字末笔明显下垂，这种笔势也较早；此外，龟体较扁，呈伏状，龟首微突，也属早期特征，所以，此印的时代定在西汉中期为宜。但从篆体也可称摹印篆风格看已较方正，故时代不会早至文景时期。笔者完全赞同。查《鉴定》一书的汉代中期的官私印，在中原地区有“田”字格的已罕见，但此印是发现在岭南徐闻县情况或有所不同，也有可能是本地区镌刻的。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批玺印可作佐证。

2. 关于私印“臣”字的含义。古玺印大致可分官印、私印、肖形印和成语印（含箴言印和吉语印）几类。“臣固私印”的“臣”是印主的称谓，“固”是名，私印表明非官印，这是明白不过的。如上所说，作者一开始就把它作为官印，并对“臣”字作了不恰当的解释，那必然会对印主的身份、职官及其职能作了种种猜测和比附。如果作者查查辞书，就不难明白，“臣”字是有多种含义的。尤其是对私印而言绝不会只有对皇帝称臣的朝廷命官一种含义。

从《鉴定》一书第58至59页，可知私印姓名印战国已经出现，汉代姓名私印遗存尤多。其形式多种多样：有刻姓名的，如“范海”“樊宽”“解莫如”（均为西汉、铜质、龟钮印），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前期墓也有“李嘉”印。有姓名之下加“之印”“私印”“印信”或“信印”的，如汉代的“谢相私印”“吴永私印”，东汉“刘永信印”（前两者为铜质、龟钮）。有名上加“臣”或“妾”字的，如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前期墓出土的“梁奋·臣奋”（穿带印）；又如“臣寅”“妾撰印”，又再为西汉“胜·臣胜”“尹宽·臣宽”“鲜于富昌·臣富昌”（均为铜质、穿带印）等等。由此可见，徐闻南湾村出土的“臣固私印”（见图二），正符合上举的汉姓名印的名上加“臣”的实例。正如叶其峰给笔者信中指出的，汉印中镌有“臣”的甚多，古人称臣不一定对皇帝，互相之间也多自称为臣，男自称臣，女自称妾，是汉人的习俗。由于印章乃交往的信物，在印章中镌臣字是自谦，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鉴定》一书还写道，汉私印姓名印所用的质料有铜、玉、琉璃、木、石、银等，以铜为主，其次是玉。“臣固私印”属铜质。

汉姓名印的体态主要有正方、长方、圆形等几种。方形印边长多在1.2-1.3厘米之间，

普遍比官印小。“臣固私印”属长方形。

汉私印姓名印的钮式，玉印多覆斗钮，铜印则主要有坛钮、桥钮、龟钮、辟邪钮等。铜质龟钮上文已举例过。“臣固私印”钮式为龟钮铜质。

由此可见，如若将“臣固私印”误作为官印，那么就可能引申出许多与官印相关的似是而非的问题来。

我国自秦汉以来，历代官印皆有定制，故可以从玺印的大小、质地、钮式、印文称谓和文字体例等方面，考订官印的职别及年代。

东汉蔡邕《独断》云：“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以玉螭虎钮。古之尊卑也。……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然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宋书·礼志》：“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钮。”汉承秦制，1968年陕西咸阳发现的西汉“皇后之玺”白玉质螭虎钮可以证明。为什么帝后玺要用螭虎钮呢？应劭《汉旧仪》解释，“印者，因也。所以虎钮，阳类，虎，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群下也”。附带一说，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龙钮帝印是1983年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西汉官印无此钮式，南越王国“文帝”玺用龙钮可能与当地民俗有关，也很可能是本地制造的。龙钮玺印与帝后联系在一起可能是从五代开始的，实物有四川发现的前蜀王建墓出土的“皇帝谥宝”。

《汉旧仪》亦云：“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铜、犀、象为方玺，各服所好。”又谓：“丞相、列侯、将军金印，紫绶；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青绶，皆龟钮，其断狱得，印为章也。”又谓：“尚书仆射、铜印青绶。”“(武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银；以下铜印”。

3. 关于西汉官印的铜质印和龟钮问题。如前所揭，我们已推断徐闻出土的“臣固私印”属西汉私印姓名印，质地为铜，钮式为龟。为了进一步作比较研究，应当了解两汉时代铜质龟钮官印有关的规定。<sup>[25]</sup>



图二 汉铜质龟钮“臣固私印”及其铭文（徐闻二桥南湾村出土）

铜印：西汉史籍记载，佩带铜官印的为秩比二百石至千石官。

《汉官仪》谓：“千石以下铜印。”《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

按汉朝制度，官吏等级，是以所得俸禄多少为准。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等名称（笔者按：石，量名。《说苑辨物》“十斗为一石”，按旧制，石为升之百倍即十斗。石，今读“担”音。）中二千石者月俸为一百八十斛谷，二千石者为二百斛谷，比二千石者一百斛谷。按汉制，郡守、诸侯、相并为二千石官。也就是说秦汉的郡守、郡尉、太守、都尉、御史等得授银印，相当于享受二千石的俸禄。但铜印的佩带者则要低得多。

再说龟钮。据目前所知的材料，官印中的龟钮大概出现于西汉文景时期。所见最早的官印龟钮实物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轅侯之印”。在汉代，龟钮是高级官吏佩印的钮式。当时高官印章为什么要用龟钮呢？应劭《汉旧仪》解释说：“龟者，阴物，抱甲负文，随时蛰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

汉代龟钮官印与质地关系是十分密切的。(1)凡金质官印均龟钮。现今遗存的如西汉“石洛侯印”，东汉“广陵王玺”“朔宁王太后玺”等。又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泰子”印和“右夫人玺”。(2)凡银质官印均龟钮。《汉旧仪》云：“银印，皆龟钮”。今遗存的有“琅琊相印章”“武猛中郎将”“武猛校尉”等。(3)秩比二千石铜印亦用龟钮。如汉秩比二千石官“校尉之印”“奉车都尉”“驸马都尉”等。又“关内侯”及东汉之乡，享侯也用龟钮。<sup>[26]</sup>

4. 关于“臣固私印”印主身份地位的蠡测。前面说到，“臣固私印”的“固”是印主名字，然“固”何许人也？史树青先生检索过《汉书》、《后汉书》以固为名者 20 来人，但无一人与徐闻有涉。吴凯文章推断“固”印《后汉书》的窦固，少为黄门侍郎，后又封显亲侯，且与往交趾的马援有过“交结”；进而推测他当为“黄门译使”、左右侯官，说他肯定与交易有关。如此一来，就有印主与印章的年代不合及一人顶数人，一身兼数职之嫌。

不过，笔者在想，“固印”虽是一枚私印，但它毕竟是龟钮，印主当会明了汉代龟钮之含义，它又是出土在二桥、南湾、仕尾这一片很可能就是西汉徐闻郡县治所的地方，而“固印”的年代又正好与二桥、南湾遗址的年代相当，这种状况不得不使我们思考，“臣固私印”印章当不会是一般的私印。

《鉴定》一书说，私印是指私人使用的印章，包括姓名印、箴言印、吉语印和肖形印，其定名是与官印相对而言。官印的本质是信，私印的姓名印代表着个人的信誉，因此其本质与官印相同。能否这样理解，即私印姓名印虽不能从印文称谓上显示印主的职官或社会身份和地位，但这不等于说私印印主就是没有社会身份地位和不拥有财富的，也不排除印主是当官的。

这从《鉴定》一书中历代私印印文可以得到证明。如战国私印印文有：“圣人”“君子”“上下和”“自私”（即“自爱”）、“千秋”“千秋万世昌”“宗昌”“富有百万”“千百万”“宜



官”“官安”“长官”“宜有金”等等，这类希望健康长寿、家族、财富兴旺发展和仕途发达的成语箴言。又如1971年冬发掘的广西合浦县城东南牛望岭汉代大型土坑木椁墓，全长25.8米，最宽处14米，主室有一具漆棺。随葬品有铜、铁、陶、漆器、金饼、金珠和水晶、玛瑙、琉璃、琥珀等饰物等240件。据研究，墓中所出的玛瑙、琉璃、琥珀等装饰品，可能是从海外运来的，这与当时合浦是对外贸易港口有关。墓中仅出一件琥珀印章，阴刻篆书“庸母口印”三个字；两件陶提箫的内壁，有朱书“九真符”字样。该墓可能是曾任九真郡守的官吏或其亲属的墓葬。

另4座坐落在合浦的堂排至埔口的汉墓与牛望岭墓差不多，其中有一座出土一枚“劳邑执割”琥珀印，是岭南出土的另一枚“执割”印，据推测墓主人可能也是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吏或屯戍该地的武官。<sup>[27]</sup>

如上所说，牛望岭汉墓出土的一枚琥珀质地的“庸母□印”印章，质地非玉非金，“庸母”两字似乎亦非官职，如果不是出自这座大型结构和随葬器物丰富高档的墓，而是偶然单独出现，其墓主的身份恐怕也是无从推定的。由此可见，私印姓名印并不意味着就是无社会地位无官职的一介平民。

至于“固”为何人，则有待继续探索。会议期间即11月24日晚，笔者再到海滨宾馆住地向朱家潘老先生请教，他随即拿来一纸一笔，写下九个大字：“郡太守属下，主簿，从事。”朱老说，这印可能是郡守的主簿或从事，“臣”可作“在下”解，月俸大概是几百石到六百石，也可能高一些，你们再去查查书籍。朱家潘老先生的提示，值得我们重视。《汉官仪》和《汉书·百官公卿表》已说明铜官印秩在比二百石至千石官。

查辞书，主簿，官名。汉代以来中央机构及地方郡、县官府都设有主簿，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为掾史之首。州、县主簿皆汉时置。州主簿录门下众事，省署文书；县主簿主诸簿目，历朝皆有。从事，官名。汉制，州刺史之佐吏如别驾、治中，主簿、功曹等，均称为从事吏。又有部郡国从事吏，每郡各一人，主管文书，察举非法。

返回广州后，脑海里不时萦回着徐闻古印尚未解读和如何解读的问题。

偶读中山大学张荣芳教授等撰的《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一文（提交这次海上丝路会议论文稿），颇受启发。一方面是对汉代徐闻在军事战略、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如文章中指出：徐闻位于雷州半岛的南端，扼琼州海峡的咽喉，不仅是汉朝控制海南岛的关键所在，而且是汉朝对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实施有效管辖的关键所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每当海南岛上（儋耳、珠崖两郡）和交趾等地发生动荡，汉廷大都以徐闻、合浦作为用兵的大本营和军事基地。“合浦是当时两粤通交趾的咽喉……马援人交，主要靠的是海路”。这个合浦郡包括了徐闻。另一方面，通过张文对汉代徐闻重要性的深刻剖析，如对于汉置左右侯官的考释（认为“侯官”在这里是“官署”的意思，而不是官员的意思，笔者表示完全赞同，例子不必多举）以及西汉“朱庐执

“朱庐执封”印在海南岛乐东县的发现和西汉“劳邑执封”印在广西合浦汉墓的出土，为进一步考释徐闻“臣固私印”（见图二）铜印，拓展了视野。换句话说，要解徐闻“固印”的历史之谜，除了寄希望于对五里乡二桥村、南湾村的进一步考古发掘外（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还应联系两汉时期徐闻、合浦及其周遭郡县的历史地理和人物状况。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在张荣芳、周永卫论文的注释5中，提及拙作《“朱庐执封”银印考释——兼说朱庐朱崖问题》（载《海南民族研究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说笔者该文是认为朱卢县治在海南岛。其实笔者是主张在海南岛以北的。如拙文写道：“不过，既然它是在汉元帝罢弃海南岛上的珠崖郡后的战略形势之下设置的，又明确地属合浦郡（汉置合浦郡辖县五：徐闻、合浦、高凉、临允、朱卢，朱卢设都尉），因而它的故治在海南岛以北即今雷州半岛或广西合浦、博白、玉林是合乎逻辑的。”文中还有一句话是，“朱印”的发现，不能佐证汉代珠崖郡在今崖县。因为“朱印”在乐东县发现，并不能证明今乐东县是朱卢县治。笔者提及这个问题的用意是，在考释“臣固私印”中，不仅要注意徐闻，并考虑为什么它在五里乡二桥、南湾出土，还要把思考的视野放得更宽阔些，“朱庐执封”汉印的发现及其说明了什么问题，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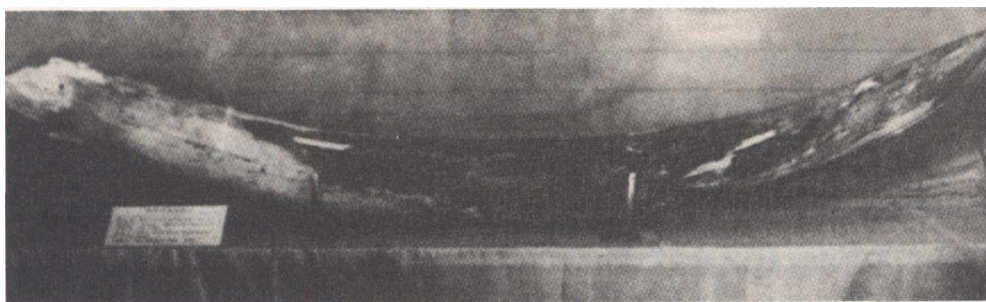
总之，以上是笔者看了徐闻县二桥、南湾村出土的“臣固私印”铜印实物之后的补充考释意见，如能引起更多的同好来关注考证这枚珍贵印章，想必将会对汉徐闻县的历史大有裨益，岂不幸哉！

其二，说一下“万岁”瓦当等建筑材料的发现。1990年和1993年在仕尾、二桥和南湾村两次调查的发掘，出土绳纹板瓦和筒瓦一万多片，还有部分长方形砖，瓦当和一件石构件。瓦当计7件，其中发掘出土的5件，2件是脱离地层采集的。“万岁”瓦当3件（据杨晓东文，笔者只见2件）。完整1件是1990年仕尾村采集，当面直径14.5厘米。边轮较宽突起；外圈线以内用十字形双线分格当面成四部分。左右格饰双线卷云纹，上下格阳纹篆体“万岁”二字，另一件“万岁”残瓦当两字与上一件完全相同。年代据共存其他遗物定为西汉中期。

笔者认为，据1993年的发掘和断代，1990年发现的“万岁”瓦当也应定为西汉。另外还有4件至5件圆瓦当，直径都在14厘米左右，当面边轮或宽或窄或三重凸棱，饰卷云纹、卷草纹或T字形卷云纹。如上所描述卷云纹圆瓦当或“万岁”文字瓦当，都与西汉都城长安（今西安）等地出土的“长乐未央”“长乐无极”“千秋万岁”“千秋”“万岁”“长乐万岁”这一类吉语圆瓦当同一风格特点。<sup>[28]</sup>从西安、宝鸡、凤翔等地至广州市中山五路新大新公司基建工地和中山四路南越国宫署和五华狮雄岭西汉宫殿，汕头市澄海县龟山西汉城址以及福建崇安汉城等遗址同类万岁瓦当、卷云纹瓦当的发现，可证它们都是重要的宫殿、宫室或宫府的建筑材料。所以徐闻五里乡二桥村一带发现的“万岁”文字瓦当和大量砖、瓦等也是符合汉代郡县制的县级或以上的使用材料的制度。由此推断，徐闻出土“万

岁”瓦当、云纹瓦当的遗址，应当就是西汉设置的合浦郡治或徐闻县治所在地。因为这个地方与历代方志所记载的“徐闻城、汉元鼎置、海滨讨网村、讨网港、前临大海、峙三墩”的地理方位是吻合的。

其三，关于大小象牙的发现。不久前，笔者从报端获悉，湛江市徐闻海域发现了珍贵的大象牙（见图三）的消息。这次终于在湛江市博物馆一睹真面目。大的一件，2000年6月在东经 $110^{\circ}47'70''$ ，北纬 $20^{\circ}31'50''$ 海域水深约13米处捞获的，也即徐闻县东北外罗镇与新寮镇之间的外罗港外的海域渔民作业时捞获的，是通明港村居民薛昌连、欧碧军等5人捐出的。该象牙相当完好，表面牙黄色有些赭黑色锈斑，仅根部有些残缺。长210厘米，最大围宽50厘米，重47公斤，即近百市斤。这样完整的古代大象牙实属罕见，弥足珍贵。据阮应祺馆长告诉笔者，在大象牙出水的附近曾打捞出元代陶瓷等物。我们看到陈列在展柜中有一件相当精致完好的龙泉窑系的元代青釉暗花瓷罐，器腹有“清香美酒”四个大字，重达8.3公斤，说明牌上写着：1999年5月在 $E110^{\circ}28'$ ， $N20^{\circ}52'$ 海域，水深约16米处捞获的，也就是说很靠近大象牙出水的位置了。



图三 非洲象牙（徐闻县外罗港海域打捞出水）

另一件小象牙没有写说明牌，大约长度在60-70厘米，牙白色有些残损，据说是在湛江市硇洲岛南部海域打捞出水的。据笔者推测，大象牙是非洲象牙，小象牙可能是亚洲象牙，应做进一步的鉴定和保护，以防其损坏或裂开成片状。虽然我们对大象牙的年代未能确认，但它是珍贵的海上丝路的舶来品似无疑问。在这次参观当中，笔者还看到多件出自雷州半岛海域的古陶瓷，如唐宋的双耳罐，四耳罐，有鎏带把壶，青釉碗等，也有年代较晚的陶瓷，有个别的陶瓷由于沉没海底时间长表面附着牡蛎或珊瑚礁。总之，他们都与外销陶瓷有密切关系。1982年文物普查及前后，笔者曾到过雷州半岛各市县，因而对遂溪、廉江、吴川、海康和湛江市唐、宋、元、明、清的窑址及其产品的外销情况亦有所了解，这里就不赘说了。

### 三、南海“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

说起水下考古，对笔者等老考古工作者来说，既亲切，又陌生。说亲切，是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领导和指导下，广东许多重要的水下考古有关的事，都与广东省



博物馆、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密切相关。1974年至1975年两次西沙考古和1987年台山川山岛海域宋元之沉船文物；1989年11月中日合作对“南海沉船1号”调查研究；1992年春广东新会银洲湖宋元“崖山海战”遗迹调查；1996年、1998年至1999年两次西沙群岛水下文物抢救发掘。1993年中方与日本朝日新闻企划部在日本几个城市举办“南中国海海域沉船文物展”，笔者有机会参加了在广岛县博物馆举行的展览并参观了在京都的水下考古研究所，并听了其所长田边昭三教授的讲座。说陌生，是水下考古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广东的正式工作才刚刚开始，至于水下考古的一整套新设备和操作方法，我们更为陌生。<sup>[29]</sup>

### （一）浅议水下考古

水下考古，也称水底考古、水中考古。水下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或称特殊考古学，从水下特别是海底考古所用的手段和方法与田野（陆上）考古不同，所以它是陆地考古的补充和延伸。

中国水下考古报告系列（一）《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一书的“前言”说得更为明白：“水下考古是对一切水域遗留下来的古代人类文化遗存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出现的一门考古学分支学科。无论是古代沉船还是古代港口，无论是在海洋还是在江河湖泊，所有沉没在水下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与遗物都是水下考古的工作对象。因此，水下考古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水下考古实际上还可以看作是田野考古学在水域的延伸，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水下调查发掘工作，为此发展和形成了一整套调查、发掘的技术和方法，并广泛应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相关技术，包括潜水物理、潜水生理、潜水医学、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遥感物理、水下工程等，从而使水下考古独立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考古潜水是水下考古同陆上考古的主要差别……因此水下考古学者必须掌握现代常规潜水技术。水下调查、定位、勘测、发掘和记录各环节的工作更明显有别于陆上考古；出水文物必须运用一整套包括脱水、脱盐、去锈、防腐等特殊文物保护、处理技术。”

“我国拥有辽阔的水域，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航海历史十分悠久。中国古代的丝、瓷、茶、铁等享誉世界，古代帆船满载着中国人民对世界经济文化的重大贡献扬帆中外，历代沉船成为水下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保护和利用这些珍贵的水下文化遗产，是摆在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面前迫切而艰巨的任务。”<sup>[30]</sup>

“水底考古”的萌芽可上溯至16世纪意大利人在海底探寻沉船。到了20世纪初期，水底的考古调查在世界各地进行，最有名的是在墨西哥奇琴伊察玛雅文化遗址的“圣池”中寻求牲人和祭品，在突尼斯赫迪耶港的海上探索满载古希腊美术品的罗马沉船。

1943年发明了“潜水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改进了设备和条件，才使真正的水底考古学得以成立。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法国人在马赛附近海底发掘沉船，接着美国考古队在土耳其附近海底发掘希腊罗马时代和青铜朝代晚期的沉船，不仅获得船中的许多古物，而且还为研究古代造船术、航海术、海上交通和贸易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水底考古学的对象从沉没物、沉船扩大到淹没于湖底、海中的都市和港市等的遗址，而勘察、发掘及摄影记录等手段和方法也大为改善，使水底考古学以显著的速度不断取得新成果。可以认为，水底考古学是田野考古学在水域的延伸。<sup>[31]</sup>

水下考古或说“海洋考古”就是通过调查、发掘和研究古代人类从事海洋活动之有形的物质遗存，进而探讨遗存背后的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无形的层面。

海洋考古，海洋社会文化，既包括船舶、港口、码头、栈桥、海洋贸易物品、海上移民等有形的海洋文化“环境”，还有约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政策，体现海洋人文传统的习俗与族群心理倾向等无形的海洋文化层面。

海洋考古对于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巨大。由于古代人类海洋活动是多方面的，因此，海洋考古的学术领域也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主要包括沉船考古、海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三大领域。它们对于海洋社会经济史学都是有为可作的。<sup>[32]</sup>

我国的水下考古或说海洋考古，也有一个从陆上走向水下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些东南沿海省份陆续发现了一些因埋藏地淤积成陆而得以在陆上发掘的古代沉船，如福建连江敖江的西汉独木舟和泉州后渚的宋代海船，浙江宁波东门口的宋元海船，上海嘉定和南汇的两处宋船等，其中以泉州和宁波的沉船规模最大。

我国水下考古机构的成立，是激发于一个偶然的事件。1985 年，英国捞宝商米歇尔·哈彻(Michel Hartcher)在我国南海海域盗捞一艘清康熙年间的沉船，船上的航海日记证实该船是 1750 年驶离广州往荷兰途中沉没的。哈彻从船上获得 1.5 万件青花瓷和 125 块金锭，并于次年公然在阿姆斯特丹苏富比拍卖行拍卖 3000 件，获得 3700 万荷兰盾，此举震惊了考古界。这一偶然的非法事件，促使中国政府决心改变水下考古无力开展和海洋文物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1987 年 3 月在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部、海军作战部、国家海洋局、交通部、外交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的协调下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同年 11 月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成立“水下考古研究室”。1989 年国家文物局委托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Adelaide University)举办了首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闽、粤等省的 11 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并获得专业证书。就是信托这支队伍，近 10 年来相继在福建连江定海，广东台山川山岛，辽宁绥中三道岗等海域调查发掘出一批宋、元、明的重要沉船资料，标志着我国海洋考古工作的真正开始。<sup>[33]</sup>

我国水下考古重点南移广东，南海 1 号水下考古世人瞩目。

说起广东的水下考古，笔者作为广东省博物馆的一位老文物考古工作者，可以说既亲

切又陌生。说亲切，是我馆考古人员于1974年至1975年两次的西沙考古及其成果，既在捍卫领海主权中发挥作用，又大大地丰富了馆藏文物，在阐明南朝至明清的南海丝绸之路研究中发挥效应。1988年台山川山岛南宋一元沉船打捞的200件珍贵文物移交我馆，经专家研究，船上的陶瓷来自浙江龙泉窑系、江西景德镇窑系、福建德化窑系和泉州磁灶窑系，船上还有1米多长的镀金腰带和一件锡壶，似非本国产品，推测它可能是古代波斯的一条从福建开航的商船，在台山海域遇风浪沉没。

南海1号探测工作原来由日本水下考古部门资助，但后来因经费不到位而搁置。经过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努力，终于在2001年4月10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广东省考古所等有关部门在广州召开了“南海1号水下考古调查”授旗仪式暨新闻发布会。这次开展调查测位等工作得到香港中国水下考古探索协会资助120万元，整个探测工作估计耗资150万元。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去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广东宣布中国水下考古以南海（广东）为重点。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室主任张威说，南海沉船探测工作的再启动就是突破口，并宣布以阳江市闸坡作为陆上基地。<sup>[34]</sup>

广东沿海主要沉船遗址一览表：

台山市川山群岛外海域“南海1号”沉船遗址；

新会市官冲宋元“崖海大战”沉船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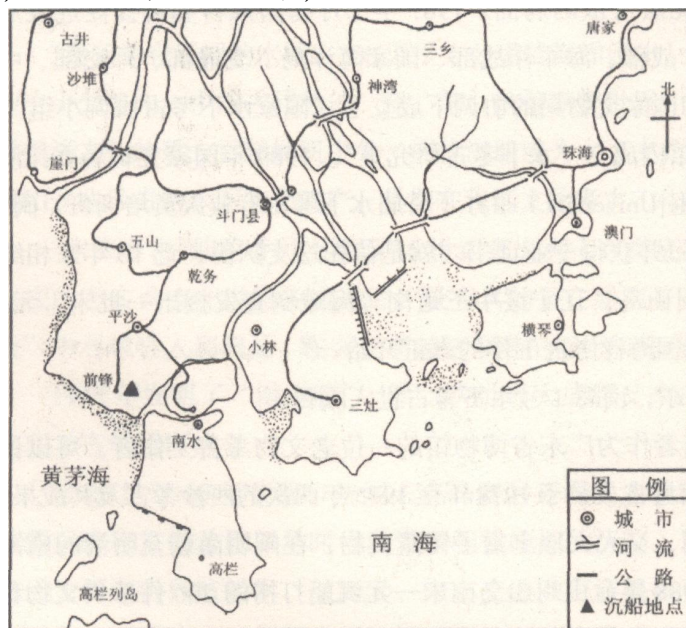
珠海市平沙前锋沉船遗址；

汕头市广澳明末清初沉船遗址；

吴川县吴阳镇沙角派沉船遗址；

电白县坡心镇沙琅江独木舟遗址。

以上只是主要的，就笔者掌握的线索，实际上还要多。



图四 珠海平沙前锋农场围海造田后沉船位置示意图



在本文截稿搁笔之时，收到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赠予的《建所十周年文集》巨著一书（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见有《珠海平沙沉船发掘》一文，这是水下考古在广东沿海地区业已开拓的明证。1996年笔者兴致勃勃地到平沙发掘现场参观了沉船残骸及一批出土物，但这次撰稿苦于未见正式发掘资料。现在既然见到了就不应遗漏的。特此补充简介如下。

1995年7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所和平沙区宣传文化科等单位的同志，到平沙前锋农场八队调查、考察海外交通史迹和宋元海战古战场遗存，发现一艘沉船。前锋农场位于平沙区政府南面约2公里，距今海岸线约1公里，原是一处大海湾，属黄茅海的一部分（见图四）。20世纪60年代围海造田成为陆地。发掘时沉船就埋藏在围堤下鱼塘淤泥中。该船船板取样作C14测定，数据为距今 $690 \pm 100$ 年，约相当于宋末元初时间。于是在1996年9月进行发掘，清理出一艘长达三十多米的“广式”平底木船，出土了一批陶瓷器、玻璃药瓶、铜构件、铜钱和银币等物件。其中青花瓷器具有清末民初广东民窑风格，玻璃瓶有“香港邝又生”“解毒丸”字样。铜币有一枚“乾隆通宝”钱币。银币有十多枚法属“印度支那铸造”的字样。有自由女神坐像及“REPUBLIQUE FRANCAISE”，年代是1908年和1909年。铜币有正面“IN DO CHINE FRANCAISE”和“百分之一”，年号有1897年、1901年、1911年、1912年等。该船沉没原因是毁于火灾。

这次考古发掘证明，珠海平沙沉船不是原先推测的与宋元大海战有关的沉船，而是一艘民国初年仍航行的广式平底运输货船。但是，作为在广东沿海地区第一条经正式发掘出土的沉船，仍有其重要意义。它为广东沿海地区沉船的调查和发掘，为水下考古工作在广东的开展积累了初步经验。

总而言之，我国的水下考古、海洋考古事业方兴未艾，广东一岭南的水下考古，前景无限光明。它的深远意义绝不仅仅在考古学和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不言而喻的。

## （二）南海“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

关于海外关系史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一是要掌握我国境内发现的外国的遗迹和遗物，并确定他们出土或出水的准确地点和时代；二是要研究他们的出土地点与当时的海交路线、航线的关系；三是要了解和研究我国海交遗物遗迹在国外的发现，也即中国古代文化文明向世界传播的情况。把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构成我国海外关系史考古学研究的全部内容。<sup>[35]</sup>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国内外考古发现的遗址、遗物材料在此举不胜数。本文前举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海交通贸易二千年》两书中展示的材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要使之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刻，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则有待今后加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我们相信，在广东省以及有关的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下，在业已取得的丰硕资料的基础上，今后广东的南海海上丝路和水下考古，必将取得更大的成果，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

## 注释：

[1]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年）；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1959年）；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向达：《中外交通小史》；方豪：《中西交通史》（两册，岳麓书社1989年版）；[英]D. G. E. Hall 霍尔著：《东南亚史》（上册），（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日]藤田丰八：《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收入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海交史研究》第3期；岑仲勉：《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等：《宁波港海外交通史论文选集》，1983年版；方志钦、蒋祖缘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通史》古代上册亦有系统论及。

[2] 李克勤：《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世界之路》，《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99年版。

[3]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

[4] 同[3]。

[5] 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等：《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广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市政局合办并编写《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并在香港出版。

[7] 杜经国、吴奎信主编：《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汕头出版社1998年版。

[8] 李建生、陈代光主编：《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雷州城》，海洋出版社1995年版；广东省博物馆（何纪生执笔）：《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海上丝绸之路·湛江专号”。

[9] 参看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10] 参看张广智主编：《世界文化史·古代卷》“前言”。文中同时指出，不同地区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和平的交往，如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暴力的交往，如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的扩张、阿拉伯帝国的征服与蒙古成吉思汗的西征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版。

[11] 据查实，饶宗颐教授1974年6月在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海上之线路与昆仑舶》一文，正式提出了“海上丝路”的名称，比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早了5年，以前有人以为“海上丝路”一名是三杉隆敏最先提出的。饶宗颐先生说，中国丝绸，自古迄今，闻名海外，故以“丝路”或“丝绸之路”，作为中外交通的象征，尤为恰当。“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互通使节，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中国古籍早有记载，只是并未冠以“海上丝路”的美称，后来又有人称“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白银之路”。见王翔：《谁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10月9日。收入郑炜明编《论饶宗颐》一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版。

[12] 参看徐苹芳：《在西部开发中关于中外关系史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12日、8月19日；又《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及其发现的外国遗物》，《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9日（未见文章内容）。徐苹芳在前一篇文章指出，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西南地区便有与南亚或西亚交往的考古证据。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和云南江川李家山22号墓均出土蚀花肉红石髓珠，它是在鸡血石上用化学的方法腐蚀出各种花纹（笔者按：还有一种说法是，蚀花珠饰相信是东南亚地区的产品，当地土著用一种植物的汁液在珠饰上腐蚀花纹而成），公元前两千年前即在西亚和南亚出现。江川李家山22号的年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说明西亚、南亚与中国西南地区交通，并不比张骞通西域晚，张骞在大夏时已见邛竹和蜀布。比张骞通西域稍晚一些的还有晋宁石寨山西汉墓出土的中亚或西亚的列瓣铜盒。笔者在此补充一句，石寨山西汉墓出土的列瓣纹铜盒，与广州南越王墓的银盒有相似之处。

[13] 同注[9]，《中外交通史》“导论”。

[14] 同注[6]。

[15] 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16] 邓瑞本：《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载《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17] 丁守和主编：《中华文化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18] 王冠倬编著：《中国古船》，海洋出版社 1991 年版。
- [19] 广东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20] 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3-395 页。
- [21] 关于我国古代外销瓷的书刊和文章数量甚多，这里仅举几种：[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 1988 年版；周世荣、魏止戈著：《海外珍瓷与海底瓷都》，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 年版；广东省博物馆（宋良璧主编）：《广东省博物馆馆藏陶瓷选》，文物出版社 1992 年版；栗建安：《名为“汕头器”，实乃“漳州窑”》，《中国文物报》2001 年 9 月 19 日；又《SWATOW 与漳州窑》，载澳门《文化杂志》第 34 期，澳门文化司署出版 1998 年版。
- [22] 广东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徐闻县汉代遗址的发掘》，《文物》2000 年第 9 期；崔勇：《徐闻二桥村汉代遗址与汉代徐闻港的关系》，《岭南文史》2000 年第 4 期。
- [23] 同注[22]，又据阮应祺馆长给笔者的信函。又据关家玉等：《小小汉印两次险被偷》一文又谓：“此印给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社乃松先生鉴定，认为是汉印，年代属西汉，定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原载 2000 年 9 月 6 日《湛江晚报》，收入《海上丝路探秘》一书，徐闻县委、县人民政府编 2001 年版。
- [24] 据吴凯文说，“张己印”边宽 1 厘米，高 0.6 厘米，瓦钮，印文小篆体，刀法雕工细腻，确为珍品。因该印与汉代陶罐、陶钵、陶纺轮、规矩铜镜以及“大泉五十”铜钱一起出土，故可定为新莽时期。又说，印主“张己”，若是平民只能用章，而不能用印，何况，其墓内随葬品也较丰富，说明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如此看来，是没有真正弄清楚私印与官印的区别，大概又是把“张己印”看成是官印了。
- [25] 参看叶其峰著：《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9-42 页。
- [26] 同注[25]，第 40-41 页。
- [27] 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6 页。
- [28] 戈父编著：《古代瓦当》，中国书店出版 1997 年版。
- [29] 详见张威主编：《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中国水下考古报告系列“前言”，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30] 同注[29]。
- [31] 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 17-18 页。
- [32] 吴春明：《试说海洋考古与社会经济史学的整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 [33] 参看注[32]吴春明文；又参看《绥中三道岗元工沉船》一书俞伟超序。
- [34] 参看《羊城晚报》2001 年 4 月 11 日；《澳门日报》2001 年 4 月 18 日；又耿宝昌：《喜见中国水下考古队再出海》，《中国文物报》2001 年 4 月 20 日。
- [35] 同注[12]。

作者：杨式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广东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馆刊》主编，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南方铜鼓和东南亚青铜器文化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社科院客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文物考古专家。

（本文选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文史》2002 年增刊）